

# 禹会遗址年代的初步分析

陈 杰

禹会遗址因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禹会村而命名。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实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把禹会遗址列为子课题之一，希冀通过禹会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揭示出淮河流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轨迹。经过2006年的初步钻探和2007~2011年的五次较大规模的发掘，禹会遗址发现了大型的祭祀台基等遗迹，发掘获得了重要收获。

禹会遗址背靠涂山，地名又与《汉书》所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的传说相符，所以从发掘之始，禹会遗址一直被认为是探索大禹遗迹的重要史前遗址。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发掘者通过对出土的陶器等特征的分析，认为禹会遗址是淮河中游一处单纯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带有龙山文化晚期的普遍特征。这一判断正好与文献传说中所谓的大禹时代基本相吻合，因此，很多人直接把禹会遗址解读为“禹墟”。这是否符合考古的实际情况呢？笔者认为，确定禹会遗址是否为“禹墟”，关键问题是判定遗址的年代，因此本文拟根据禹会遗址目前公布的发掘材料，对禹会遗址的年代进行初步分析，请方家指正<sup>[1]</sup>。

目前，禹会遗址公布的考古材料基本以考古简讯为主，发掘者主要重点在于介绍发现的祭祀台基、祭祀坑、祭祀沟、建筑遗迹等。在有限的材料中，发掘者也选择了重要遗迹出土遗物进行了介绍，特别是发表了祭祀沟JSG和祭祀坑H2两个遗迹的材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禹会遗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sup>[2]</sup>。

根据目前公布的资料，禹会遗址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红陶、灰陶、灰褐陶和夹砂白陶，陶器以素面较多，可辨认的有绳纹、弦纹、波浪纹、篮纹等，可复原的器形主要有鼎、盘、盆、甑、壶、假腹簋、长颈壶、圈足壶、盃、罐、缸、钵、器盖等。根据JSG和H2两个遗迹的遗物特征，我们可以发现禹会遗址的文化因素组成十分复杂。发掘者已经指出禹会遗址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江淮地区南京牛头岗遗址、长江三角洲地区广富林遗址、钱山漾遗址以及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禹会遗址与周边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在较大的时空背景下探讨禹会遗址的年代提供了可供对比的资料。由于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就每一类器形都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仅就典型的、具有时代特性的器物进行简要比较，以推断出禹会遗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中的年代定位。

## 1. 禹会遗址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比较

---

作者：陈杰，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研究方向：先秦考古。  
上海市人民大道201号，200002。

海岱地区位于黄河下游，是龙山时代文化谱系研究较为深入的地区。从1928年吴金鼎先生发现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以来，关于该地区龙山文化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大量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为龙山文化研究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研究，海岱龙山文化系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关于海岱龙山文化分期虽然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方案，但是对于器形的演变关系的认识大致相同。在各类分期方案中以栾丰实先生的分期方案较为详尽。他根据典型陶器的演化关系，把山东龙山文化划分为六期10段，各期之间基本不存在缺环。同时，栾丰实认为在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发展过程中以第三、四期之间的变化较大，因此他又将山东龙山文化合并成两个大的阶段，即前三期为早期阶段，后三期为晚期阶段。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认为海岱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早、晚期阶段的分界，约在距今4300年前后<sup>[3]</sup>。

禹会遗址受到了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重要影响，禹会遗址的许多器形和装饰风格都与后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较为典型的有鬼脸式足鼎和陶鬻（图1）。

禹会遗址鬼脸足鼎可复原的仅见2件盆形鼎，虽然弧腹、圜底的造型与海岱地区的盆形鼎略有差异，但是其附加鸡冠耳或环状扳手鏊手的装饰风格却在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早期阶段广泛存在。此外，发掘显示禹会遗址虽然鼎以侧装三角形足为主，但是共出的鬼脸足也有一定的数量。鬼脸足是山东龙山文化重要的鼎足之一，有的学者称之为“鸟首形足”，它主要流行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早期阶段，比如在栾丰实的分期研究中，就认为鸟首形足主要流行于龙山文化的偏早阶段，如果进行细化，大致相当于其分期方案中的第3~7段。以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为例，其主要遗存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海岱龙山文化早期阶段，各类鼎足中就以铲形和鸟首形足最常见，且形制和装饰的变化也较多<sup>[4]</sup>。

禹会遗址的夹砂陶鬻有多种形制，与海岱地区相关的主要是朝天流的实足鬻。目前发布的材料较为完整的器物有H2:1（《蚌埠禹会村》中重新编号为JSK1:2），整体器形为粗高颈，颈部与腹部相连没有明显分割，三足似为实根，鬻把手为绞丝状。除了已发表的这件陶鬻的资料，承蒙发掘者惠允，笔者曾在遗址中看到颈部与腹部分界明显的一类陶鬻（《蚌埠禹会村》中编号为JSK2②:35），腹部为圆腹，鬻足为实足跟。根据海岱龙山文化的研究，这类陶鬻的演变特点是颈部由细到粗，腹部从深变浅，三足自略深的款足向底部近平的实足发展，因此后者从形制上较H2:1更早。这类朝天流的实足鬻主要流行于山东龙山文化的第1段至第3段时期，进入第4段后则甚为少见，到了其晚期阶段则以矮颈、肥硕乳状袋足鬻占绝对优势。

因此，仅仅根据禹会遗址目前发表的鬼脸式鼎足和夹砂陶鬻与海岱龙山文化的相关比较，可以推断禹会遗址大致与海岱龙山文化早期阶段遗存共时<sup>[5]</sup>。

## 2. 禹会遗址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比较

20世纪之前，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发展谱系，学术界普遍认为它开始于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发展到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由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变化突然衰落，接替良渚文化的本地区文化是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1999年以后，上海考古学者持续在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发掘者辨认出一类不同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原土著文化的一类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sup>[6]</sup>。材料一经公布即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之后，相邻的浙江、江苏等地的考古工作中也陆续发现了一批与此类遗存相关的遗址。根据考古学命名的原则，我们把这类遗存命名为“广富林文化”<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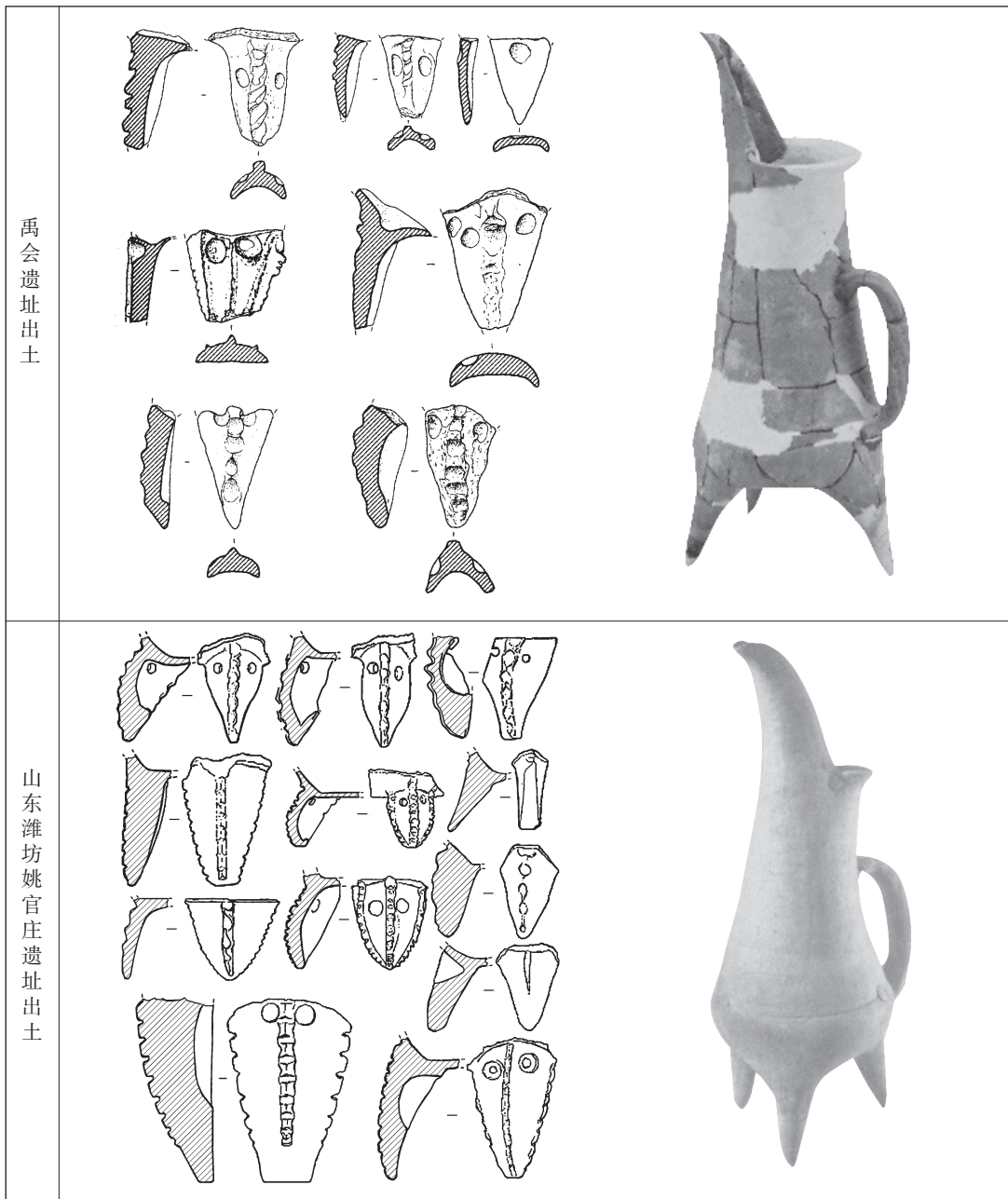


图1 禹会遗址出土遗物与海岱龙山文化的比较

广富林遗址是目前经过发掘的包含广富林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遗址。广富林文化的主要陶器主要器形有鼎、瓮、釜、鬻、罐、豆、盆、圈足盘、钵、杯、刻槽盆等。鼎是数量最多的器形，也是广富林遗存代表性器形之一。鼎口沿有折沿和卷沿之分，沿面一般内凹，唇面有一道凹槽，腹部多饰有弦纹，部分器表饰绳纹，鼎的底部一般有错乱交错的绳纹。鼎足形态多样，以侧扁三角足最多，剖面为椭圆形，足尖有按捺成勾状的特点（图2-1、2）。瓮、罐等器形一般都是有着较为发达的肩部，腹部下收。广富林文化的

夹砂陶鬲（图2-3、4）器形变化较大，其中有多件袋足鬲与海岱龙山文化的器物相似。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认为广富林文化的大致年代相当于海岱龙山文化的晚期阶段。

禹会遗址的发掘者在进行区域比较时，特别注意到了遗址出土的侧装三角足的特征，指出禹会遗址侧装三角足的足尖处几乎全有按窝，按窝的力度均较大，足尖处似乎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缺口，这类鼎足与广富林文化类似鼎足之间形制较为接近，但是发掘者也指出了两者的不同，如在广富林文化的鼎中以圜底为主，而缺乏禹会遗址中常见的平底鼎等。实际上，从器形特征、纹饰装饰特点来看，禹会遗址与广富林文化的夹砂陶鼎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也确实存在着



图2 广富林文化的陶鼎和陶鬲（广富林遗址出土）

明显的差异。特别以陶鬲的形制来看，两者的区别可能主要是由于时代差异造成的。

实际上，在以往多次发掘中，广富林遗址曾发现一类以鱼鳍足的鼎和细长颈鬲为代表的遗存，根据地层关系，这类遗存的年代晚于典型良渚文化，早于广富林文化。这类遗存的陶器主要器形有鼎、罐、鬲、豆、缸等。鼎身以折沿、垂腹为主要特征，部分鼎的上腹部有凸弦纹作为装饰。鼎足有鱼鳍足、鸭嘴状凿形足、顺装舌形足、圆锥足等。罐的常见形制为厚唇、折沿、深腹，腹部常装饰有弦断或抹断的篮纹。鬲，以泥质红陶为主，基本形态为细长的鬲颈和大袋足。这类遗存1950年代首先在浙江钱山漾遗址发现，在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中也证实新石器时代堆积中可以划分出前后两段，发掘者称之为“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和“钱山漾二期”文化遗存<sup>[8]</sup>。实际上，“钱山漾二期”文化遗存就是广富林文化，而“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由于与良渚文化之间关系密切，又与广富林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关于其文化内涵，目前争议较大，有的学者认为它仍属于良渚文化，有的学者则认识它属于广富林文化的早期阶段，也有学者建议可以直接命名为“钱山漾文化”<sup>[9]</sup>。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进一步判断其文化属性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段时期的遗存，特征显著，时代清晰，可以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遗存，我将之暂名为“钱山漾阶段”遗存，它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海岱龙山文化的早期阶段。

如果将禹会遗址与“钱山漾阶段”遗存相比，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更多的相似性（图3）。

首先，两者陶器表面的纹饰装饰风格十分相似。如钱山漾阶段遗存的陶器装饰纹样有绳纹、篮纹、弦断绳纹或篮纹、方格纹、条纹、凹凸弦纹、水波纹、刻划纹等，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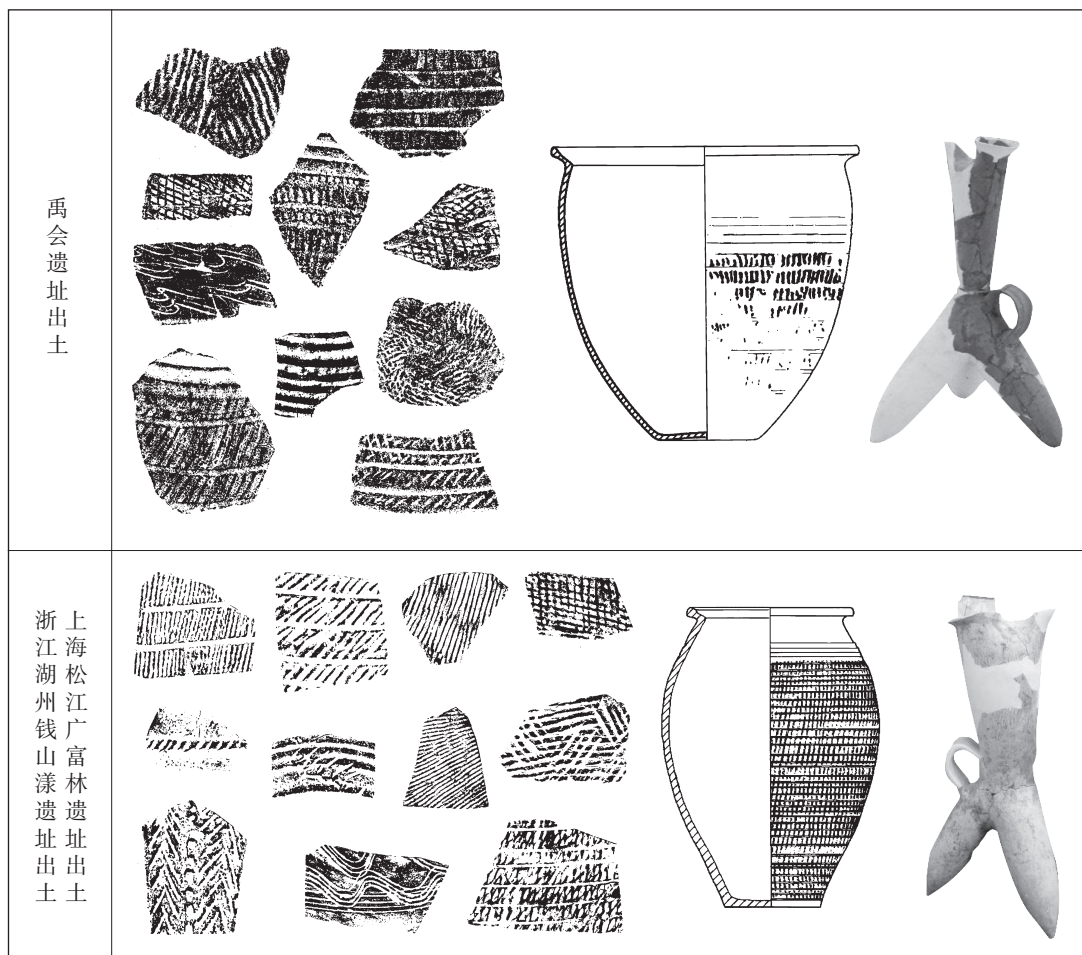


图3 禹会遗址出土遗物与钱山漾阶段遗存比较

以弦断绳纹或篮纹最为盛行，这与禹会遗址的纹饰装饰特点相似。

两者器形较为相似的有大口瓮（深腹罐）、袋足鬲等。钱山漾阶段遗存的大口瓮以钱山漾遗址的出土物较为完整，瓮为侈口，斜方唇或厚圆唇，沿面内凹，上腹略鼓往下渐收为小平底，腹部饰弦断篮纹或绳纹；禹会遗址已经发表的几件大口瓮，虽然与钱山漾阶段遗存同类器在器形上略有差异，但是器表纹饰风格基本相似。袋足鬲是钱山漾阶段遗存代表性的器形，细高颈，长圆的袋足是其主要特征。关于细高颈袋足鬲的年代问题，宋建、栾丰实等先生都有详尽的讨论，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争议，但是大家都倾向于这类鬲属于龙山文化早期阶段的遗物，甚至更早<sup>[10]</sup>。禹会遗址中也曾出土过多件细高颈袋足鬲（根据《蚌埠禹会村》报告），由于此类鬲的时代性强，它可以作为探讨禹会遗址年代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钱山漾阶段遗存中也有少量鬼脸式鼎足共存，这与禹会遗址的情况相似。因此，根据器物的比较研究，禹会遗址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钱山漾阶段遗存具有明显的联系，两者基本同时，属于龙山文化早期阶段遗存。

### 3. 禹会遗址与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比较

禹会遗址发掘者在进行比较研究时,指出禹会遗址与牛头岗遗址也存在一定的联系。牛头岗遗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2001~2003年南京市博物馆对遗址连续进行了三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牛头岗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比较深厚,时代跨度长。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西周晚期,各个时期的地层堆积变化明显,时代分界也较为清晰。遗址堆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中早期文化遗存以泥质黑陶和夹砂灰褐陶为主,纹饰主要有多种形式的篮纹、附加堆纹、网格纹等,器形主要有鼎、甗、鬲、罐、盆等(图4),其中鼎多为垂腹罐形鼎,鼎足有鱼鳍形足、凿形足、鸭头形足和少量的鬼脸式鼎足,鼎足根部流行对捏等装饰手法,陶鬲为附冲天流的袋足鬲。发掘者认为,折沿、垂腹、圜底的罐形鼎和附冲天流的陶鬲、鬼脸式鼎足都具有较多山东龙山文化典型器物的特征<sup>[11]</sup>。



图4 南京牛头岗遗址出土遗物

根据笔者与发掘者的交流,牛头岗遗址中除了垂腹鼎外,还有部分与钱山漾阶段遗存类似的器形,如附乳钉足的泥质黑陶壶、细高颈的袋足鬲、饰弦断篮纹的罐(瓮)等。因此,牛头岗遗址早期遗存的年代大致与钱山漾阶段遗存相当。根据上文的分析,其年代也大致相当于海岱龙山文化的早期阶段。由于禹会遗址与牛头岗遗址在鼎足、陶鬲、鬼脸式鼎足、饰弦断篮纹的罐等器形上存在一定的共性,可以推断两者之间时代接近。

除了牛头岗遗址之外,江淮地区同时期的遗址还有安徽肥西古埂遗址晚期遗存、南京太岗寺遗址等<sup>[12]</sup>。

#### 4. 禹会遗址与河南龙山文化的比较

河南龙山文化的组成较为复杂,根据不同的特征,又大致可以按照地域分为豫西区、豫中区、豫东区和豫北冀南区。目前关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分期,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如豫西地区,一般把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称之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其他区域的龙山文化又按照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划分方式,大致采用二分法,区分出龙山文化早期和晚期两大阶段<sup>[13]</sup>。

由于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时,已经发现属于豫东王油坊类型的文化因素。因此,在禹会遗址的比较研究中,发掘者很自然把侧装三角形足的因素与王油坊类型联系起来,认为两者存在密切联系。但是,根据目前发表的资料,除了鼎足的工艺特点外,我们很难寻找到其他具有共同特征的器物或组合。但是,如果我们如果把禹会遗址与豫东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进行对比时,就能发现一些共性的器物(图5)。

目前较为明确属于豫东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较为典型的有郸城段寨遗址和鹿邑栾台遗址。郸城段寨遗址的文化堆积大致可以分为三期,早期与大汶口文化相似,中期为龙山文化早期,晚期为龙山文化晚期<sup>[14]</sup>。鹿邑栾台遗址的遗存大致可分六期,发掘者认为第一期为龙山文化早期,第二期为龙山文化中晚期,第三期为岳石文化,第四至六期为商文化遗存<sup>[15]</sup>。段寨遗址由于为试掘材料,可资对比的材料较少。栾台遗址虽然把遗址的龙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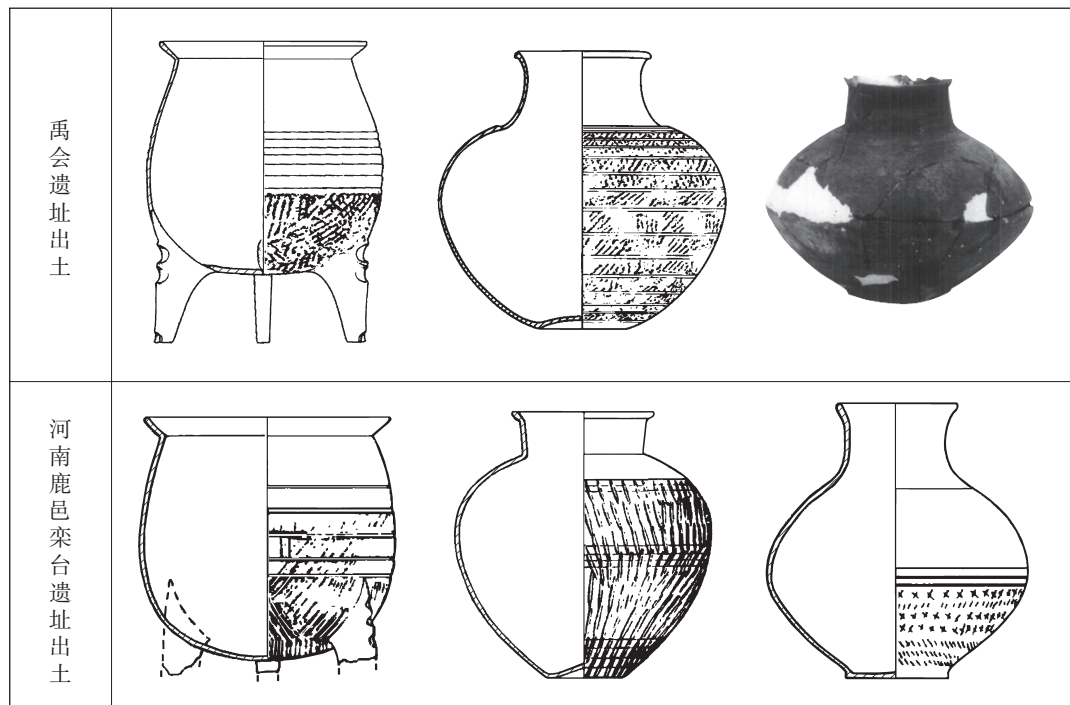


图5 禹会遗址出土遗物与豫东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比较

遗存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但是如果按照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看，简报中所发表的⑩层下开口的J1及其所打破的地层⑪的遗物，无疑应该属于龙山文化早期阶段的遗存。

栾台遗址的鼎，侈口，深腹，最大径偏下，圜底，腹壁饰弦断篮纹，侧装三角形足，足上有按压纹，这与禹会遗址的鼎有一定的相似性。此外，栾台遗址的鼎足除了常见的侧装三角足外，还有带沟槽扁凿足、“鬼脸”式足等。栾台遗址的小口高颈罐，侈口，直颈，鼓腹，底内凹。腹下饰浅疏的弦断绳纹，它与禹会遗址祭祀沟出土的鼓腹罐特征非常相似。两个遗址的扁腹壶的造型也存在一定的共性。因此，根据比较，禹会遗址的年代应与栾台遗址龙山早期遗存相当。

##### 5. 禹会遗址与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比较

禹会遗址的发掘者已经在发掘简报中指出邓家湾遗址中属于屈家岭文化的甑（H89：1）与禹会遗址所出的甑器形基本一致。而在属于石家河文化的遗物中，陶盃出土量较多，并有长颈捏流和长颈管状流两式，这两种器形在禹会遗址中均有发现，形制基本与长江三角洲钱山漾阶段的细高颈袋足鬻相同。同时，发掘者也指出禹会遗址的凹底罐的风格很可能与江汉平原地区存在密切关系，因为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均流行凹底罐，两者之间器物造型也非常一致。

由于目前的资料较少，我们尚很难指出禹会遗址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直接的关系，但是从总体风格而言，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屈家岭文化一般认为绝对年代在距今5000~4600年之间。而关于石家河文化的认识，学者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把石家河文化划分为三期，认为早期遗存表现出过渡性的

特点,既承继了屈家岭文化的传统,又具有石家河文化的新特点;中期是石家河文化的确立时期,其陶器的典型特征和风格已经形成;晚期,从器形特征和纹饰风格上,都与前两期有明显的差别<sup>[16]</sup>。甚至有的学者直接把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遗存称之为“后石家河文化”<sup>[17]</sup>。或者直接称之为“三房湾文化”,其绝对年代,早期似在距今4200年,晚期在距今3900年左右<sup>[18]</sup>。根据石家河文化中出土的少量细高颈鬲的共存关系,它也与长江下游地区的钱山漾阶段遗存年代相当。因此,如果禹会遗址与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存在一定联系的话,它应该是属于龙山文化的较早阶段。

综上所述,根据已发表的出土文物资料分析,禹会遗址的时代特性较强,但是其文化因素组成复杂,它与周边地区诸多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几乎涵盖了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下游龙山文化、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江淮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因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与周围相关文化遗存的比较分析,可以较为准确地判定禹会遗址的相对年代。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禹会遗址相对年代与海岱龙山文化早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钱山漾阶段遗存、南京的牛头岗遗址、豫东龙山文化的早期遗存和石家河文化大致相当。禹会遗址的绝对年代,发掘简报中曾经给出2个数据(《蚌埠禹会村》共公布6个数据),经过树轮校正后的年代相当于距今4400~4200年之间,参考海岱地区龙山文化、长江三角洲地区钱山漾阶段遗存和广富林文化的绝对年代数据,笔者认为禹会遗址发表的绝对年代数据基本符合其考古学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 注 释

- [1] 本文完稿时,《蚌埠禹会村》发掘报告尚未出版,因此使用材料仅限于当时已经发表的材料。2013年12月笔者参加了“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学术研讨会,获赠发掘报告并较全面地参观了出土文物,认为虽然资料更加丰富,但是基本不影响本文的结论。因此,本文大致保持原貌,只是略微增加了少许《蚌埠禹会村》发掘报告中的材料。
- [2] a.王吉怀等:《禹会村遗址的发掘收获及学术意义》,《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  
b.张莉等:《禹会遗址2009-2010年发掘的新收获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通讯》第20期,2010年。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等:《安徽蚌埠市禹会龙山文化遗址祭祀台基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1期。
- [3] 栾丰实:《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 [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
- [5] 根据《蚌埠禹会村》发掘报告,禹会遗址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关系密切的器物还有铲形足的鼎、中口罐(报告称之为A I式瓮)、圈足豆(盘)、高柄杯等。
- [6] 广富林考古队:《广富林遗存的发现与思考》,《中国文物报》2000年9月13日第三版。
- [7] 陈杰:《广富林文化初论》,《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 [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
- [9] a.周丽娟:《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末期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



- 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 b. 栾丰实：《试论广富林文化》，《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c. 张忠培：《解惑与求真——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的讲话》，《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 [10] a. 栾丰实：《再论良渚文化的年代》，《故宫学术季刊（台北）》，2003年第4期。  
b. 宋建：《良渚文化年代之讨论》，《故宫学术季刊（台北）》，2005年第2期。
- [11] a.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牛头岗遗址的发掘》，《200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4年。  
b. 华国荣等：《南京牛头岗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南京历史文化新探》，南京出版社，2006年。
- [12] a.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肥西县古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第7期。  
b. 罗宗真：《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3期。
- [13] 方燕明：《河南龙山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六十年》，《华夏考古》2012年第2期。
- [14] 曹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中原文物》1981年第5期。
- [1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栗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 [16] 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和类型》，《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
- [17] 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第10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 [18] 王劲：《后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